



哥穆尔卡 的改革探索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著



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

〔波兰〕 扬·普塔辛斯基 著

于欣 筱如 刘邦义 译

黎岚 校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Jan Ptasíński

Drugi Zwrót

GOMUŁKA u szczytu powodzenia

根据波兰华沙国内出版社1988年波兰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赵晓民

封面设计：丁 品

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著

于欣 筱如 刘邦义 译

黎岚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 8 字数: 174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012-0507-8/K·110 定价: 5.40元

(内部发行)



ISBN 7-5042-0507-8/K · 410 定价: 5.40 元

(内部发行)

李

译者的话

《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是《哥穆尔卡沉浮记——三次转折之一》（原书名《哥穆尔卡史实——三次转折之一》）的续篇，它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956年10月哥穆尔卡重返政治舞台的前前后后和哥穆尔卡治党治国14年的重要主张和活动，是了解和研究人民波兰历史颇有价值的著作之一。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人民波兰和国际共运的著名人物，他的光荣而坎坷的一生，有过1948年、1956年和1970年三次沉浮起落。1948年他被横加上“右倾民族主义”罪名，由人民的领袖变成了人民的“罪人”。1956年10月他重返政坛，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达14年之久。1970年波兰爆发“十二月事件”，他再次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并在隐居10多年后于1982年与世长辞。哥穆尔卡的一生是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生。他临终前曾对朋友们说：“我快要走了。党在解决一切困难问题时将不再有我的参与了……一个人不能死而复生获得第二次生命，假如这是可能的话，我将仍然走我曾经走过的同一道路。”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哥穆尔卡也犯过错误——不论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本书记述哥穆尔卡事迹时所表达的对他的功过是非的看法，虽非全部都为我们同意，却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

1989年波兰发生剧变。哥穆尔卡参与创建和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已停止活动。对人民波兰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

全部历史，是肯定还是否定，已成为今日波兰政界和学术思想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关心国际共运的各国朋友注意的问题之一。《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有助于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作出正确的评价。

1991年6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一、哥穆尔卡获得自由·····	1
二、哥穆尔卡要求全面恢复名誉·····	12
三、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上的哥穆尔卡问题·····	30
四、七中全会与八中全会之间·····	40
五、八中全会——哥穆尔卡重返政坛·····	45
六、为党的团结一致而进行的斗争·····	58
七、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	77
八、哥穆尔卡和农业社会化·····	93
九、工人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	107
十、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	115
十一、经济困难的克服·····	145
十二、国际共运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	153
十三、哥穆尔卡为奥得—尼斯河边界获得承认而进行的 斗争·····	182
十四、哥穆尔卡与经互会的一体化·····	228

一、哥穆尔卡获得自由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逝世。1953年7月，斯大林逝世后组成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集体领导的苏共四位活动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之一，拉夫连季·贝利亚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并被逮捕。不久之后，发表一项关于释放被捕的克里姆林宫医生的公报，这些医生曾被指控导致或加速由他们负责保健工作的苏联领导人的死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安东尼·阿尔斯泰尔领导的工作组，受命起草政治局关于对安全机关活动实行党的监督的决议草案。（我和尤利安·安德热耶夫斯基是执笔人，很遗憾，这项决议并未通过，其原因我难于理解。草案的文本收入我的文集中。）1953年12月，约瑟夫·希维亚特沃趁其出差柏林之机逃往西方，投入美国情报部门的卵翼之下。在公安部谁也没有想象到，希维亚特沃会成为坏蛋和叛徒。认识他的人都深信他是被绑架的。1954年中期，在国内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题为《反人民的秘密运动》的传单，作者是约瑟夫·米尔斯基。在公安部谁都不会知道，希维亚特沃是以这一化名前往柏林的。1954年春，后来被称为“解冻”的春天，开始出现批评迄今为止党和政府的工作，这些批评除了正确的意见外，还包含了许多蛊惑人心

的东西，更不要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赤裸裸的攻击了。党的报刊，一般说来，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但一部分党的政论家，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周刊工作的政论家，则屈服于压力。1954年8月，以鲍莱斯瓦夫·贝鲁特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其他领导成员除希拉里·明兹外，都在度假。

一天，我和罗曼·罗姆科夫斯基（在斯塔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休假期间，他代行职务）因公被召到明兹处。在谈话中，明兹突然问罗姆科夫斯基：你不认为散布在全国的那份传单的作者可能是希维亚特沃吗？罗姆科夫斯基坚决地予以否认。他重复了关于对希维亚特沃绝对信任的说法，并补充说，甚至他被绑架，他也不会叛变。明兹想了想说：这就更糟了，因为传单中提到的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这能是什么事情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罗姆科夫斯基沉默不语，我也没有详细打听。）在离开明兹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在罗姆科夫斯基的办公室里讨论当前的各种问题，忽然电话铃响了。从罗姆科夫斯基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得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他很快结束会议，只留下我们三个人（孔拉德·希维特利克、罗姆科夫斯基和我），他告诉我们，明兹打来电话：希维亚特沃在“自由欧洲”电台发表了讲话。于是谜语不攻自破了。

1954年10月，希维亚特沃逃亡后公安部的形势问题成了政治局会议的议题。公安部的四位副部长（米切斯瓦夫·米特科夫斯基、罗姆科夫斯基、希维特利克和我）都应邀参加了会议，拉德凯维奇介绍了情况，然后罗姆科夫斯基发了言，他是主管十局工作的，希维亚特沃中校也在这个局工作。贝鲁特请其余的副部长们也参加讨论，他们按照来部工作时间

长短的顺序发了言，我是最后一个（我在这个部门工作才一年半多一点），我的意见和贝鲁特“相悖”，我一开始就把建立十局来“监督”党的纯洁性看成是坏事情的根源。我们在场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发言，只有贝鲁特作了长篇讲话。他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提高警惕性的责任。他认为，挑拨是最恶毒的武器，它既不是什么新的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与革命运动作斗争的方法。他举了阿泽夫和马利诺夫斯基挑拨活动的例子，回忆了一直到波兰共产党领导层的挑拨活动的脉络。他认为，希维亚特沃是成功地在公安部长长期肆虐的这种挑拨者和间谍分子之一。在讲话的第二部分，贝鲁特指出在安全部门的工作中**有逼供的事实**，并把认罪当作构成起诉根据的证据。罗姆科夫斯基知道这些事实，但瞒着党的领导。（罗姆科夫斯基主管安全侦查机关的工作）贝鲁特指示，要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扩大党对安全机关工作的监督。贝鲁特还介绍了政治局的结论（可以认为，在政治局范围内事先已初步研究过这些结论），就是：1.改组公安部——建立两个单独的部门；2.在公安部门领导工作中，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3.注重工作质量，同破坏法制进行坚决的斗争；4.扩大党的机关对安全机关工作的监督；5.撤消罗姆科夫斯基的公安部副部长职务，并把十局局长阿纳托尔·费伊金上校、侦查局长约·鲁然斯基上校的问题提交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简单地回顾一下1954年的事件，特别是安全机关的情况，这对于说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积极分子11月会议（11月29—30日）的作用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这次会议是上述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一个月举行的。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在尖锐和激烈的讨论中，对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政府和

议会的活动进行了批评。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贝鲁特不喜欢批评，但他不得不承认，批评虽然是尖锐的，但是公正的。他还补充说，政治局是带着对自己工作的自我批评前来参加会议的。会议讨论了两天的（两个下午直至深夜），贝鲁特向与会者通报了公安机关的改组、逮捕罗姆科夫斯基，以及有关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解除罗姆科夫斯基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将罗姆科夫斯基、费伊金和鲁然斯基开除出党和将鲁然斯基的问题送交法院处置的意见。贝鲁特预言，将建立公安事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建立内务部。贝鲁特不隐讳，在公安机关的某些工作环节上，发生过一些严重破坏法制的行为，一些不能容忍的侦讯方法致使许多问题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无辜者被捕。他认为，在这些工作中主要是贝利亚思想的影响，尽管他承认成立十局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是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贝鲁特还承认，在党的最高机关的工作中，从政治局开始，没有遵循集体领导原则，没有适时地向中央委员通报情况，很少召开中央全会，而中央全会的过程也是空洞无物的。政府工作也遭到了批评。这些供讨论的论断是引人入胜的。

可以揣测，党的领导真是意想不到第一个发言的人立即提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问题。维克多·克沃谢维奇对指控哥穆尔卡的正确性表示疑问。在继续讨论中有几个人发言，他们以提问题的形式提出哥穆尔卡问题，要求予以解释。耶日·泰皮赫特问道：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阿尔图尔·斯塔莱维奇提出：人们询问哥穆尔卡主义问题，应如何回答？尤利安·芬凯尔什泰因直截了当地问道：哥穆尔卡现在的处境怎么样？

开始时我注意到，哥穆尔卡问题的出现对于领导来说是

出乎意料的，因为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言的有雅库布·贝尔曼、明兹、爱德华·奥哈布、拉德凯维奇），以及给会议作了总结的贝鲁特对这些问题和意见都未表示自己的态度。但哥穆尔卡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再也不能回避它了。约瑟夫·科瓦尔斯基的发言或许值得一提。科瓦尔斯基认为，哥穆尔卡主义的一系列不良习惯迄今未予清除。但是，任何人也不呼应他的这一意见。到了贝鲁特逝世之后，有关所谓的哥穆尔卡主义问题的政治讨论日益活跃起来了。

在11月会议上，同样涉及了瓦茨瓦夫·科马尔将军的问题，他是1952年底被波兰人民军情报部门（军事反间谍机构）逮捕的。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罗曼娜·格拉纳斯，芬凯尔什泰因在自己的发言中支持了她的意见。奥哈布对这一问题表态说：科马尔的问题将在最近几天内予以解决。对于十局的成立及其活动提出了许多令人痛心的意见，要知道，它不是自发成立的（格拉纳斯）。贝尔曼声称，他感到负有责任，因为委托他负责这一部门的工作。他承认成立十局的决定的错误，同时又把它解释成受了贝利亚思想的影响。这是明显地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正如后来我了解的那样，贝尔曼比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更清楚十局的活动。拉德凯维奇作为公安部长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过错，同时作了解释，理由是工作的特点，在部领导工作中缺乏监督、检查和集体领导原则以及战后初期复杂的政治局势。拉德凯维奇的发言不为大家所接受。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说拉德凯维奇的发言肤浅，一般化，什么也没有说清楚。鲍莱斯瓦夫·鲁明斯基惊奇地问，为什么拉德凯维奇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明兹在谈到已经出现的歪曲时，把右倾民族主义倾向也列入其中。他为政治局的活动进行辩护。他问道：难道我们

掉脑袋了吗？他坚决地回答：“没有。”他还补充说，是党具有大无畏的胆识。（后来把这句话传得越来越神，说正因为如此哥穆尔卡才保住了性命，当然，这与事实不符。）

在11月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为波兰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恢复名誉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列昂·别尔斯基，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表达了绝大多数波共原党员的观点，不相信解散波共的证据。在走廊上，波兰元帅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斯太凡·斯塔舍夫斯基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回忆了波共活动时期的痛苦经验。但他究竟想说什么，很难揣测。我认为，他是不赞成别尔斯基的观点。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问题，我在各个不同时期曾同波共党员交谈过，他们虽然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他们坚信，那是一个极端的错误。我观察了这些共产党员的悲惨命运，我对此也毫不怀疑。但是，在当时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对别尔斯基的意见，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表态。

同样，在11月会议上，第一次尖锐地批评了党的最高机关和政府的工作。不仅批评了政治局的工作作风，而且还批评了政治局委员。对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的工作的批评性评价，我已经做过介绍。对明兹也提出了许多意见。耶日·普特拉门特直截了当地指出：明兹使一切陷入了绝境。

批评政府官僚主义，陷入细小的事务中而绕开属于政府工作的原则问题。会议对议会工作徒具形式表示不满。这大概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积极分子第一次向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头上泼了冷水。毫无疑问，党的领导已经意识到出事的征兆，但后来事实表明，并未觉察到它的规模。

11月会议后不久，1954年12月7日，根据国务委员会的法令，把公安部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公安事务委员会由当

时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领导，而内务部由迄今的国家监察部副部长瓦迪斯瓦夫·维哈领导。

德沃拉科夫斯基目睹政治局历次会议上戏剧性的讨论和对其前任的批评，因而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命。他感到在这个机关里工作很“不自在”，难于驾驭广泛而复杂的问题，难于掌握第一次碰到的名词术语。政治局委托德沃拉科夫斯基去完成的首批任务之一，是通知哥穆尔卡获得释放。（当时哥穆尔卡正在伏洛夫斯卡大街即今天科马罗娃大街医院专门隔离的房接受治疗）从表面上看，公安事务委员会领导人上任伊始的任务是让人不断地感兴趣的，但这项任务却使德沃拉科夫斯基这位华沙冶金工人、老共产党员，这位一身正气的人感到吃惊。1952年，在诺沃特科牺牲10周年之际，德沃拉科夫斯基作为中央书记承担了发表演说的任务。在他的那次讲话中，有那么一句说哥穆尔卡是“帝国主义间谍”的令人可怜的话。这句话后来使德沃拉科夫斯基忐忑不安。在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他作了解释，说他不能原谅那一过错。奥哈布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声称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对此负责，也不能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但是，当1954年12月13日，德沃拉科夫斯基前往释放哥穆尔卡时，1952年11月的那次讲话，就必然成为难于克服的障碍了。尽管哥穆尔卡并不知道那一讲话的内容。他很难面对面对哥穆尔卡说：“您是无罪的。”我观察过德沃拉科夫斯基，他在办公室里踱步，陷入沉思，显得焦躁，并推迟了出发的时间。

我们在德沃拉科夫斯基办公室里等着他从哥穆尔卡那里回来。他回来时很沮丧。这次谈话给他印象很深。他不愿意透露详情。他只讲道，他向哥穆尔卡作了介绍，说他是新任

命的公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宣布，从现在开始哥穆尔卡自由了。哥穆尔卡问，他的妻子佐菲亚现在怎样了？得到的回答是，她获释了。德沃拉科夫斯基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说这时哥穆尔卡说：“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我们从德沃拉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仅仅这些，这之后，这位领导前往贝鲁特那里汇报去了。后来，从1956年4月9日哥穆尔卡给政府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信中得知该信送给中央委员传阅，哥穆尔卡询问德沃拉科夫斯基逮捕他的原因，德沃拉科夫斯基回答说：“国家利益要求这样做。”

关于从监狱释放哥穆尔卡的消息，既没有告知公众舆论，也没有告知广大党员。但这一消息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正在准备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三中全会。

1955年1月，当中央委员们出席三中全会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知道哥穆尔卡获释了。贝鲁特在报告中强调了最近几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要指11月会议）在揭露党内生活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弊端的意义。第一书记认为，不管阶级敌人的反抗是减弱还是增强，扩大国家教育职能的时期到来了。他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安全机关讲的，他认为安全机关没有及时地觉察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他承认，建立十局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通报了有关波兰人民军情报机关工作中严重歪曲事实的情况。贝鲁特告诉全会已撤消对哥穆尔卡的隔离，但他告诫说，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对哥穆尔卡主义的态度。

这次中央全会上的讨论，是围绕着安全机关工作中发生歪曲的责任问题进行的，确切地说，是围绕着十局的活动问题进行的。在人事方面不仅涉及拉德凯维奇，而且也涉及贝

尔曼。同1954年11月会议上一样，拉德凯维奇的发言不为大家所欢迎。克沃谢维奇惊奇地问，为什么要任命拉德凯维奇为国营农场部部长，斯塔莱维奇和斯塔舍夫斯基则要求把拉德凯维奇从政治局中清除出去。耶日·阿尔布莱赫特补充说，拉德凯维奇对许多坏事视而不见。奥哈布和弗朗齐舍克·尤兹维亚克考虑到拉德凯维奇的功劳，在发言中袒护了拉德凯维奇。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贝尔曼作了长篇发言。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喻之为“不幸、痛苦、惭愧”，可以说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就是如此。贝尔曼的态度遭到许多中央委员的尖锐批评。联系到贝尔曼在11月会议的发言，克沃谢维奇认为，贝尔曼的自我批评是不作自我批评的典型，因为他竭力把一切都“倾注”在贝利亚主义的头上。不错，贝尔曼在全会的发言中承担了责任，但他声称我们大家都同样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显然他指的是政治局委员）。奥哈布对此有同感，并补充说，贝尔曼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要负责任。贝尔曼提到政治局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但他承认委员会的工作既不彻底又无成效。他请大家不要忘记“许多难以解开的网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大多数发言对贝尔曼的工作提出批评时，只有瓦迪斯瓦夫·马特温起而捍卫贝尔曼，尤利安·科莱甚至断言，贝尔曼是不容许任何批评的。

哥穆尔卡问题没有直接提到三中全会上进行讨论，虽然许多人的讲话内容基本上受到了哥穆尔卡问题的影响。克沃谢维奇不无原因地含沙射影地回忆起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自我批评；他遭到了奥哈布的驳斥，奥哈布认为，再提1948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的事是不正确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中虽然有几个人发言，但是谁也没有联系或忆及哥穆尔卡问题。包括贝鲁特，他在总

结中也以巧妙的沉默回避了哥穆尔卡问题。然而，这时的哥穆尔卡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强烈地震撼着党，越来越顽强地提出一个问题：哥穆尔卡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党的领导对公布关于释放哥穆尔卡公报一事仍然拿不定主意。

三中全会上的讨论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安全机关工作中的歪曲问题。贝鲁特的报告有许多地方谈到国内经济形势问题，这成为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从事工作的中央委员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的谈到了银行的新作用问题（塔代乌什·迪特里赫），有的谈到了基本经济指标的相互关系问题（塔代乌什·盖德），有的谈到了低工资问题（莱翁·乌茨基）和劳动时间的利用问题（尤利安·多卡爾斯基）。还交叉地谈到了遵守党内民主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党群关系等问题。贝鲁特在总结中谈到了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提到了自由讨论的气氛。他认为，批评性意见，特别是关于国民经济形势的批评性意见是正确的，尽管这种批评性意见还不是太多。他批驳了鲁明斯基和米切斯瓦夫·波皮耶尔，因为在他们的发言中他看到了把中央委员会同自己的政治局对立起来的企图。他告诫，不要试图把批评集中在政治局中一名委员的身上（很明显，他所指的是贝尔曼），因为这会破坏政治局的团结，尤其是当敌人加紧反对党的领导的时候。第一书记强调指出，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党的团结。他号召中央委员，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捍卫党领导的威信。在今天不难看出，对哥穆尔卡的命运感到罪过，才是发出这一号召的原因。哥穆尔卡的形象越来越从忘却中明显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应该承认，三中全会对于党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虽然，会上进行的讨论不像11月会议那样尖锐、激烈和坦率，但党的最高机构毕竟接受了11月会议的成